

武当山庙会持久兴盛因由寻绎

刘玉堂¹ 贾海燕²

(1.长江大学 楚文化研究院,湖北 荆州 434023;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楚地信仰与宗教的互嵌、玄武神降日与民俗节日的契合、恢宏宫观建筑与绚丽自然风光的辉映、开明宗教政策和广泛信众来源的互洽是武当山庙会历千年而不衰的原因。

关键词:武当山;庙会;兴盛;原因

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9-0029-07

由武当山道教真武信仰而产生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庙会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法精确考证。从典籍记载来看,武当山道教宫观始建于唐太宗时期。唐末杜光庭编撰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已将武当山列为七十二福地的第九福地,说明唐代武当山已跻身于道教名山之列。至于三月三的真武信仰祭祀活动,最早可考的文献记载在北宋,与之相关的三月三玄帝神话定型在南宋,而有关武当山三月三庙会繁盛状况的文字描述则出现在元初。^[1](P44~50)]故综合考量,武当山庙会的成型最迟在南宋时期,至今已持续兴盛达千年之久。

然而,迄今为止,对武当山庙会持久兴盛的原因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是武当山庙会乃至武当道教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缺环。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武当山庙会持久兴盛的原因予以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楚地信仰与宗教的互嵌是其深厚的土壤

武当山庙会的持久兴盛,同楚地源远流长的信仰与宗教的互嵌形成的深厚土壤不无渊源,这主要体现在楚地巫俗与岁时活动、楚地玄武与北方、水神合一的信仰和武当道教地位的不断提升等方面。

(一)楚地巫俗与岁时活动为武当山庙会构建了节日时空

武当山庙会之所以能产生和繁盛,与故楚地长期盛行的巫术活动有关。武当山群山延绵,相对来说较为闭塞,该地及其周边地区自古就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在记述武当郡风俗时,引《汉书·地理志》云:“汉中风俗与汝南郡同。有汉江川泽山林,少原隰,多以刀耕火种。人性刚烈急躁。信巫覡,重淫祀,尤所好楚歌。”同书在谈论楚地风物习俗时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至今在武当山东南部的南漳、保康等地,民间盛行着一种舞蹈,叫端公舞。端公即民间对巫师和道士的称谓,其仗剑、念咒、步伐和武当道教的踏罡步斗颇有相似之处。人们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端公舞三步一顿的步伐,很可能就是在先秦楚地盛行的“禹步”。禹步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不乏记载,主要以“禹步三”为主。武当道士也大多认为自己的科仪步伐是由禹步演化而来。又故楚地民间巫师作法解禳,常披发跣足,仗剑念咒,与玄天上帝披发仗剑的形象极为相似,故王光德、杨立志等认为玄天上帝的形象最开始就是根据巫师或符箓派道士作法时的模样塑造的。^[1](P58)]由此可知,民间巫术对武当山庙会斋醮科仪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两周之际,楚地已有与庙会相关的岁时活动,如春季社日、三月上巳节的出游与祓除,以及秋季登高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武当山庙会”(JRZ2012018)

第一作者简介:刘玉堂(1956—),男,湖北大悟人,博士,博士生导师,长江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楚文化暨中国文化史研究。

与望祭神灵等活动已经在楚地出现。至少在春秋时期的二月,楚地就常在野外举办社日聚会活动。《墨子·明鬼》载:“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墨子将楚国的“云梦”与齐之“社稷”相提并论,当认为两者是同一类祭祀场所。所谓“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今人或以为是指“男女青年聚集在一起观看灌尸(性交)表演,然后分散择偶野合”。^{[2](P148)}而据《周礼·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说明是青少年男女在社日期间尽兴欢聚一类的活动。汉以后的社日,虽没有先秦“男女之所属而观”的景象,但祭祀、宴会、游乐仍是其主题,青年男女自由选择恋人的习俗依然得以保留。宋人沈辽《踏盘曲》云:“湘水东西踏盘去,青烟白雾将军树。社中饮酒不要钱,乐神打起长腰鼓。女儿带环着幔布,欢笑捉郎神做主。明年二月近社时,载酒牵牛看父母。”^{[3](P148)}这首诗描绘的正是故楚地湘水流域青年男女在社日之时踏着鼓声,在社树下载歌载舞,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民间社祭常设在大树下,即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谓的“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楚地为中心的南方的社日不仅仅是祭祀和青年男女约会的佳期,还是成年人的宴会和儿童娱乐的场合。南宋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一》就记载了当时社日野外宴会游玩的情景:“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三月的上巳节,水边的祓除活动大约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同时进行的还有踏青游玩活动。踏青在古代原本也是一种祓除活动,即在春光明媚的阳春三月上旬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到野外把身上的晦气、邪气除去。《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士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三月三还有食蛋祈嗣的习俗,故有谚云:“三月三,吃鸡蛋。”唐代,三月初寒食节(清明节期间)的踏青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此时长江中游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正是踏青的绝佳时节。如杜牧《江上偶见绝句》有:“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縠燕参差。”来翊《鄂渚清明日与友登头陀山寺》云:“落花风里数声笛,芳草烟中无限人。”宋代以后,上巳节日渐式微,但寒食清明春游的风气更甚了。

金秋的九月九日,原是故楚地登高祭神、驱邪避祸的岁时节令,后来演变成为登高健身的全国性民俗节日。九月九作为岁时节令在楚地起源甚早。《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而

关于九月九登高活动的最早记载也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襄阳^{[4](P198)}。《太平御览》卷三二引《襄阳记》云:“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高处有三登,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唐代,重阳登高在故楚地襄阳一带已成为一种时尚,并有大量吟咏重阳登高的诗歌出现,如孟浩然《和贾主簿弃九日登岷山》诗云:“楚万重阳日,群公赏宴来。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荆楚重阳登高驱邪避祸的遗风近代犹存,如民国九年《英山县志》载: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各就各胜处登高饮菊酒,以避不祥。”^{[5](P369)}

(二)楚地玄武与北方、水神合一的信仰为武当山庙会的主神崇拜涂上了底色

玄天上帝的前身是玄武。玄武为四方神之一。四方神崇拜由来已久,在先秦各诸侯的国家祀典中,四方神的祭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记·月令·仲夏》:“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礼记·曲礼》则有“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之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称为四象。四象本是天空二十八星宿的分类划分,是古人划分天区、制定历法的依据。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北、东、西、南四方,每方各七组星群,分别与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等四种动物形象对应,称作四象或四宫。四象信仰的渊源是远古先民的方位崇拜、动物崇拜和星辰崇拜的集合体。在楚公族远祖祝融居地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墓主人尸骨东、西两侧分列青龙和白虎。而在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盖上,则绘有青龙、白虎、北斗与二十八宿图。先秦四象信仰的地理范围,恰好与武当山庙会香客分布的核心区域相吻合。

在四方神的崇拜中,北方信仰在战国楚地尤其受到重视。《楚辞·远游》记载有屈原“召玄武而奔属”的浪漫远游愿望。在楚地出土的战国楚墓卜筮祭祷简中已透露出北方信仰的信息,如至上神“太一”与北极星崇拜有关,《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其中“天极星”即为北极星;万水之神“大水”与北方星辰崇拜也有关联,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载:“北方水,……[其]神上为辰(辰)星”。楚人的祖先崇拜也带有北方因素,因为楚公族先祖来自于北方黄河中游一带。楚墓卜筮祭祷简中还出现较多的“北”“北方”“公北”“北宗”等神祇,其中“北”“北方”曾与太一并出,“公北”“北宗”的祭祀规格则与太一等同等。凡

此,无一不是北方信仰产生的直接证据。^[6]

战国时期,人们对北方的重视程度已开始超过其他方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人认为北极星地位极为崇高,宇宙星辰拱卫北极星并围绕其旋转,从而将其与宇宙本源“太一”联系在一起,如《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其次,古人认为北极能主宰宇宙的气候和生机,与北极紧密关联的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与季候密切相关。楚人著作《鹖冠子》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再次,四方风以及北方在季候中对应冬天的意识出现,意味着具有萧杀之气的北方风能祛疾消灾。这种认识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7]最后,认为北方是鬼神隐伏之地的观念开始出现。及至秦汉时期,故楚地对北方的重视程度已明显超越南方和西方,甚至东方。在故楚地出土战国楚墓卜筮祭祷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巫方中,对北方的禳除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对东方的祝由法术,两者远远超过了西方和南方。^[8]

阴阳五行中北方对应的是水。《史记·天官书》云:“北宫玄武,虚、危。”《淮南子·天文训》曰:“北方水也。其帝颡项,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为玄武……”《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七神之宿,实始于斗,镇北方,主风雨。”由此可见,玄武作为北方神、水神的统一体已日渐被人们所接受。

玄武作为龟蛇的合体,与阴阳交感以生万物的现象相类比,又逐渐成为生殖之神、司命之神的化身。《周易参同契》用龟蛇纠缠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道理:“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独居。玄武龟蛇,纠盘相扶。以明牝牡,毕竟相胥。”龟蛇在古代被认为能够导引食气,是长寿不死的象征。《史记·龟策列传》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不死。龟能行气导引”。《抱朴子·内篇佚文》载:“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龟蛇长寿的功能由此延伸到玄武,故其对应的神格也能够主人生死。如北宫玄武七宿中居第一的斗宿,又称南斗。《星经》云:“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亦主宰爵禄之位。”《搜神记·卷三》“管辂教颜超延命”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如此看来,道教科仪中拜斗表示增寿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在武当山庙会期间,三月三和九月九晚间,紫霄宫都有“拜斗”法事活动。

(三)武当道教地位的不断提升是武当山庙会兴盛的重要依托

魏晋至唐,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地位逐步形成。东汉之世,武当山已开始有较多的隐士活动。南朝时期,武当山已成为“仙山”,从而有了较多的信众。唐代武当道教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民间祭祀武当山五龙神灵的习俗开始受到官方的关注,而均州刺史姚简武当山祈雨成功,更是声动朝野,武当山遂闻名天下。唐至五代,著名道士孙思邈、陶幼安、杨仙、吕洞宾、陈抟等曾在武当山修炼。宋代,官方认可的武当道教组织正式出现。武当山作为道教仙山,逐渐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为武当山庙会的持久兴盛准备了条件。

玄武在六朝时就被纳入道教神仙系统,但当时地位并不高。唐代,朝廷和民间都信奉玄武,许多宫廷、观祠都以玄武命名,就连长安城的两处北门,也以玄武称之。而因祈雨显灵的武当道教,当然也会供奉水神玄武。至五代时,随着道教教义和神仙体系的完善,北宫玄武已被纳入北极紫微大帝神系,逐步超越了原来的四象系统,成为紫微大帝的四大神将之一。由于北极太乙紫微垣在中国传统信仰中的地位极高,从而被道教奉为北极大帝,尊为四御之一,成为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并司掌四时气候之神,同时兼有统御死生寿禄、校录福罪吉凶的职能。

综上所述,武当山庙会的产生虽说直接源于武当道教的产生,但在武当道教产生之前,故楚地丰富的信仰和宗教基因的相互嵌合已形成特定的庙会文化生态。

二、玄武神降日与民俗节日的契合是其强大的动能

武当山在唐代就有信奉玄武神(真武神)的民俗,而自唐至明历代皇帝的推崇和祭祀,致使尊崇真武神的风气逐步抬升。如宋真宗赵恒将真武由方位神升格为“真君”的大神;元成宗铁穆耳更是直接把“武当福地”视为真武“仙源”的所在地,并以圣旨的名义确定真武的神格地位由真君上升为天帝,称为玄天上帝,简称玄帝。因之玄帝逐渐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宫观供奉的主神圣像,而武当山更是成为玄帝的祖庭,并有了三月三、九月九固定的神降日子。自宋至明,武当山不断超越五岳而成为太岳,武当山道教由区域性宗教团体逐步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宗教组织,与因皇室尊崇而导致玄武大帝神降日与民俗节

日的契合不无关系。

北宋立国之初,玄武还只是北极四圣之一,宋太祖首次将玄武提高到国家神的地位,并因避宋先祖赵玄朗的讳,改玄武为真武。为了缓解北方边境军事威胁带来的心理压力,安定民心,宋朝皇帝对真武神屡加封号,建庙赐额,民间真武信仰日渐普遍。宋真宗加封真武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或简称“真武灵应真君”)之后,真武一跃成为官方和民间都极为尊崇的大神。与此同时,道士们根据真武的神性特征,陆续编制了一套有关真武修道成仙、为天之大将荡妖除魔等内容的经典和科范,主要宣扬真武神的来历、出生时间、在天宫的司职、入武当山修道事迹、学养功力、形象特征和灵验传说等,对扩大真武神的影响,激发民众的真武信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北宋时期,在固定日子里祭拜真武的习俗开始分别以汴京、武当为中心由中原和汉江中上游向四方扩散。“北宋中期以前流行的道经已宣传真武生于开皇元年甲辰三月初三午时。”^{[1](P54)}至宋真宗时,固定日子祭祀真武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北宋《济州真武神殿记》载:“天禧二年有龟蛇见于都城东南隅,即真武之负足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其异。……凡神降之日,公侯贵人、宫闱戚里、朝士大夫、闾巷庶人屏居斋戒,奔走衢路,击毂争门而入,岁以为常。”这就表明,自北宋以来,在济州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兴修专门的真武道观,并出现将固定日子作为真武神降日来祭祀的现象。而济州西南的河南正是武当山庙会香客来源的核心区之一。

武当山真武神话在南宋时期基本定型,三月三等神降日已得到统一固定。虽然宋朝皇帝对真武的封号未突破“真武”系列,但道教本身凭借“三清上帝”及“昊天玉尊”之名,册封“玄武”为“玄天上帝,领九天采访使职。”南宋淳熙十一年以后,“玄帝”之号已随着《玄帝实录》一书的印行而传播四方,标志着有关真武的神话已相对成熟,形成了较规范的系统。^{[1](P49~50)}综考《玄帝实录》和其他宋代经书,玄帝神话大致包括以下内容:玄帝是先天始气、太极别体——五灵玄老所化,于上、中、下三皇时曾下降为真人。黄帝时,第八十二次化身为净乐国太子,开皇元年之岁三月初三午时,产母左胁,诞生于王宫。十五岁时,辞父母出家武当山学道,历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升天。玉皇有诏,封为太玄,镇于北方。玉帝感其功劳巨大,拜其为玄天上帝。凡遇每月三七日,即下降人间,受人醮祭,察人善恶,断灭不祥。

《降笔实录》则明确了两个最重要的神降日子:“玄帝降诞时,正当上天开皇初劫,乃下世黄帝紫云元年岁在甲午戊辰月初三甲寅日庚午时”,而“至黄帝紫云五十七年岁次庚寅九月丙戌初九丙寅日”,玄帝得到升真,五龙捧圣,直登天境。

南宋时期,以武当山为本山,以崇奉真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符箓袪禳、强调忠孝伦理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正式形成。此时,武当山五龙派扩建宫观,奉旨敕度道士,教团日趋正规,信众日益扩大。作为真武神重要的诞辰日、升真日,已被道士们设计在三月三、九月九两个特定日子里,与故楚地民俗节日恰好重叠,故得到大量信众的尊崇和参与,群众性的信仰活动日益高涨。统治者的不断推崇尊号,道教士将真武荡魔、司命、慈悲的神降职能与民众冶游、祈福、敬老、登山的民俗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更受信众的拥戴。于是,以集中朝山进香为标志的较大规模的武当山庙会活动便风生水起。

由于元代皇室对武当山的推崇,特别是元成宗将真武的神格由“玄武灵应真君”升格为“玄天元圣仁威上帝”,并将武当山作为玄帝的“仙源”所在地,各地崇奉武当山为玄帝祖庭的信仰也逐渐产生。继元成宗之后,元仁宗进一步加大了对武当道教的扶持力度。究其缘由,看上去与似乎与皇庆年间张守清多次祈雨成功有关,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万寿节(古代称天子生日为万寿节)与玄帝诞辰日同为三月初三,求雨成功似乎更是因为元仁宗与玄帝的“缘分”,因而三月三诞辰的玄天上帝便倍受尊崇。元仁宗一朝,武当道教加赐宫额“天一真庆万寿宫”,张守清也被赐号为“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并为武当山建多道诏书碑刻,“自是累朝岁遇天寿节,一如故事”^{[9](P946)}。元仁宗之后的元代皇室将武当山庙会三月三固定为“告天祝寿”的专门道场和良辰吉日,每年三月初三,都要派遣官员到武当山祭祀焚香,武当道教也为其建金箓大醮祈福祝寿,年年如此,经久不衰。

元代,武当山庙会已从宋代江汉地区的区域性庙会,逐渐扩张成为全国性质的庙会活动,农历三月三、九月九已成为玄帝信众们朝山进香的盛大节日。元代《武当福地总真集》称:“至元二十六年(1289)……每岁上巳、重九,行缘受供,谒者辐辏,潇洒清绝。”《武当纪胜集·圣诞朝贺》云:“一万诚心万圣真,祝香何处不身亲。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道教经书强调武当山是玄天上帝得道之处,故玄帝常常在三月三、九月九等日子下降故地,录善

罚恶,同时受人祈福,增人福寿。这些神话传说和许多的灵验故事,经口耳相传,逾传逾远,历久弥新,对各地信众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尊奉真武神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由此激发了全国性的建设真武庙的热情。如南京鸡鸣山建有真武庙,以三月三、九月九遣官致祭,并规定“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诸神于端门”^{[10](P851)}。明朝还为庙会期间的斋醮活动御制礼乐,崇重祀典。明成祖朱棣在他编撰的《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中,专门编制了《玄天上帝乐章》。明朝祀典规定,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朝廷都要派遣太常寺官员致祭北极真武,“用素馐”^{[10](P871)}。

明清时期,武当道教作为玄武信仰的祖庭,辐射区域空前广泛,其庙会香客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真武信仰者基数之大、分布之广,已超出人们的想象。全国除新疆、西藏、内蒙和东三省没有或少有真武建筑外,其他地区均有玄帝神庙。^{[11](P130)}从香客的分布区域来看,湖北、河南的香客最多,为香客分布的核心区;陕西、山西、安徽、湖南次之,是香客分布的扩展区;江苏、山东、直隶、甘肃、江西、四川、云南则为香客分布的边缘区。^{[11](P169~203)}

信仰玄帝的信众除了定期去武当山朝山进香外,也在本地举行盛大的三月三庙会活动以示庆祝。但这些庆祝所用玄帝神像,都必须是在武当山宫观经过“开光”并在金顶朝拜过一次及其以上的。不仅如此,这些神像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必须再次去祖庭朝山,其中多数时间就在三月三或九月九。相较而言,朝奉武当的进香活动以三月三会期香火为盛,明朝礼部尚书徐学谟撰写的《太和山新敕茶庵记》云:“而十方香火,愈益炽盛;而岁时谒礼焚修之众,无问男女士庶,骈肩摩踵来归,谒饶吹诵之声,音震林谷,前驱后拥,靡寒暑昼夜间也。”明初《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8《楼观部第七》云:“(元和观)其地拥接崇山,萦带流水,四方居民每遇春三,趋谒而邀福者,莫不骈肩接踵……”其三月三庙会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三、恢宏宫观建筑与绚丽自然风光的辉映是其巨大的引力

自唐至明代,皇室与香客共同参与武当山道教宫观群建设,对提升武当道教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宏大宫观建筑与秀丽自然风光浑然一体是广大信众对武当山庙会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贞观年间,均州刺史姚简在武当山求雨成功,唐太宗下旨在武当山敕建五龙祠,拉开了武当山道教宫观建设的序幕。

宋代皇室对玄武的推崇,使得各地官吏和信众也纷纷效尤,大建玄武庙观,推广诞辰、升天的斋醮礼仪活动。此时的武当山不仅建有以供奉玄武为主神的五龙观、紫霄观等较大型的宫观建筑,还产生了擅长符篆的道教团体,经常为民众进行斋醮活动,并依靠香客的捐赠兴建宫观。

元至元六年(1269),大都(今北京)出现龟、蛇异象,被视为玄武显灵。道士们告诉皇后,这预示着起于北方的蒙古国将以神武定天下,元皇室遂大信玄武,武当山道场得以重开,道士鲁洞云、汪真常等率徒众重修了紫霄观、五龙观,翻修了进山神道,改朝换代中一度式微的庙会活动再次兴起。元代中期的武当山已成为全国最知名的道教名山,与正一道本山——龙虎山齐名,作为玄帝祖庭的武当山庙会活动已呈盛大规模并向全国蔓延。至元二十一、二年,张守清为创建南岩天一真庆宫募捐,“三月三,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12]此后每年三月三均是香客云集,施舍甚丰。一些商贾大户,竞相施舍钱财,参与宫观建设,为的是能在神降之日得到道士们的上表祈福。至元中后期,武当山已初步建成“九宫八观”等60处宫观群落,这些宫观建设的主要款项并不靠皇家的“香币”,而是靠民间信众的捐献,且捐献的重要渠道就是规模日益扩大的武当山庙会活动。

明代,武当道教的宫观建设达到顶峰。明成祖朱棣为巩固皇权,“北建故宫,南修武当”。从永乐九年(1411)开始,由朝廷安排,皇帝直接过问,几十万军民历经十四年共建成33处宫观岩庙,各类房屋近8000间,可谓“天下军民之力,辛勤劳苦,涉历寒暑,久而后成。凡所费钱粮,难以数计”^{[13](P23)}。因皇家的投资扩建,道观的富丽程度堪与皇宫媲美。

与武当山恢弘的道教宫观相映生辉的是武当山的自然风光,武当山奇峰嵯峨,气势磅礴,溪谷幽深,植被茂盛,紫气氤氲,气象万千。主峰天柱峰呈“一柱擎天”之势,周围七十二峰现“万山来朝”奇观。宏伟辉煌的宫观建筑与绚丽多彩的自然风景如水乳交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信众朝山进香。

自唐宋至明清,有着“亘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美誉的武当山自然是不少信众朝山进香的首选之地。春季朝山,游历抒怀,祝愿上天风调雨顺,祈求家人幸福安康;秋季供奉,感恩祛病延年,报神

灵丰收年成。每逢盛会,为迎合香客,武当山宫观按照惯例,都要开辟大型道场,在规模宏大的斋醮礼仪和皇家道观音乐声中,祭祀玄天上帝,并上表为香客们祈福消灾、延年丰财。武当山庙会三月三、九月九声势浩大的斋醮礼仪活动,也成为深居闺阁的妇女们春游和秋游的最佳处所。宋代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推行,纲常伦理对妇女的束缚尤为沉重,妇女们的活动被局限于家庭,但朝山进香却是例外。庙会期间,妇女们进香武当山为家庭祈福消灾,多数家庭都会尽其所能满足其要求,这既表达了善男信女们对玄天上帝的虔诚信仰,也为妇女走出闺房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故在明清时,每年三月三会期和九月九会期,来武当朝山进香的男女群体十分庞大,均以数万、数十万记。

四、开明宗教政策和广泛信众来源的互洽是其坚实的基石

明末清初,武当山及周边地区战乱频繁,武当山庙会一度受到阻滞,但当战乱平息之后,朝山进香的庙会传统便很快得以恢复。从现存的一些碑文看,清朝统治者十分强调宗教的教化功能,康熙初年由于朝廷的重视,各地信众又陆续来武当山朝圣。雍正乾隆年间湖广民众朝武当之风益加兴盛,如荆州府江陵县信众每年春秋两季相邀结伴,先期斋戒沐浴,奔走数百里上武当山进香。乾隆皇帝为笼络民心,推行豁免香税的举措,武当山各宫观的香火更加兴旺。许多宫观殿宇及神道桥梁都由香客捐资予以重修,如保存至今的凝虚观《万古千秋道俗不一捐资修理山门栏杆功德记碑阁》、金顶的《重修三宫阁记》、重修古铜殿《万古流传》等碑,均记载了朝山香客集资修缮宫观的事迹。

清朝后期至民国年间,国家危难,战乱不断、匪患频发,武当山庙宇宫观出现较多道士出走或还俗现象,以致通晓经文、斋醮科仪和道教音乐的宗教人士急剧减少。因缺乏专人看护,宫观也多有毁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武当山仅存殿宇 2000 余间。尽管如此,有组织的香会庙会活动仍未中断。武当山现存的晚清民国的楹联匾额及金石铭文记载了一些香会进香的情况,如悬挂在太和宫皇经堂的“法开元武”匾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由陕西省兴安府安康县城内“朝山会”众姓弟子敬献,匾上开列姓名 80 余人;紫霄宫父母殿前铁铸香炉系民国十二年(1923 年)湖北省老河口各香会弟子捐献,其铭文中开列的主要香会有“平安会、万福会、全福会、齐

安会、同议会、同契会、老平安会”等。香会进香组织严密,仪程规范,故能召集较多香客。据有关记载,民国时期庙会期间“从各方面集中而来的善男信女,至少以十万计”,香会的组织功莫大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山进香活动一度沉寂。但由于国家开明的宗教政策,政府每年仍拨付专款对仅存的宫观进行维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明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原回乡务农的道士如喇万慧、何本灼、方继权等重新回到宫观,教授徒弟,开展斋醮,维持宫观正常宗教活动,各地民间的朝山进香活动很快得以恢复,进香信众逐年递增,武当香火又趋于兴旺。2006 年,被丹江口水库淹没的静乐宫选择新址复建。现今,紫霄宫、太和宫、南岩宫、磨针井、复真观、泰山庙、回心庵、天津桥、南岩至金顶故道等建筑都已完成修复。

从 1988 年 3 月开始,台湾地区朝圣谒祖团到武当山进香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台湾当局放宽大陆探亲限制至 2008 年,已有 500 多个台湾朝圣谒祖团约 25 万名信众赴武当山进香,其中因捐款而名留功德碑者就有数万人,捐款达 2000 多万元。在台湾地区,有关真武、北极、太极、玄天方面的信仰十分浓厚,多有以此命名宫观者。如台北县有新北市三民路无极露天宫、三重市玄帝宫等,高雄县有大村乡九曲堂北极殿和龙目村北极殿、大寮乡会洁村北极宫、高马北极殿、凤山市北玄宫等,屏东县有潮城镇玄天宫,彰化县有北斗镇等。崇奉玄天上帝的台湾信众,对“祖庙”——玄帝祖庭武当山更为尊崇,常年派团拜祖,如台北市玄明宫坚持每年上武当山朝圣一次;台中市真武宫于 1990、1991 和 1992 连续三年都组织“回祖庙谒祖”活动。有关武当主神的称呼,大陆民间多称“真武大帝”,武当道观正式场合多称“玄帝”;台湾民众则多称真武大帝为“北极玄天上帝”“玄天上帝”等,但也有称“真武”的,如台中的“真武宫”。未以“北极”“玄帝”“无极”命名的宫观,也有许多崇奉玄天上帝的,如台中市梧棲镇永安里永安宫、西区玄灵宫,南投县奥池麒麟宫、竹山镇受德宫,嘉义县竹山天荣宫等也常常派团拜谒武当山。

在港澳信众的心目中,武当山是道教第一名山,也是研习太极拳法的最佳所在。紫霄宫丹房静地坤道院门前巷子旁搁置有 13 通进香碑,其中一座由港澳捐立的碑文称“惟武当天山,道教圣地大玄紫霄宫阙观雄伟,历代信众多曾捐助,为其流芳,刻碑永记……”;香港梁日初太极学会则,刻碑称:“欲求太极秘,必向此山行”。

东南亚地区某些华人华侨比较多的国家,如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的道教信徒,也不远万里来武当山朝圣进香。

东亚和欧美的朝圣谒祖活动为武当山进香民俗增添了新的内容,如日本国日本中国拳法联盟会、奥地利中华文化宗教考察团等都曾赴武当山朝圣进香。这些进香团的目的更多的是学习道教文化,研习武当武术。

总体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两岸交流的扩大,武当山庙会又恢复了往日的繁盛,香客来源地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核心区由湖北、河南二省变为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东南沿海一带如上海、福建、广州等省市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信仰水神妈祖的香客来武当山朝山进香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地区的香客大多崇奉集北极之神、水神、司命之神于一身的玄天上帝,从而对玄天上帝祖庭——武当山也格外尊崇,几乎每年都在神降日期间前来朝拜,其规模大有超过传统边缘区的趋势。固定的香客之外,以游历观赏武当山皇家宫观建筑和美丽自然风光为目的国内外游客也与日俱增。

开明的宗教政策,激发了信众的热情和扩大了信众的范围,而广大信众热情的高涨和范围的扩大,

又反过来推动了开明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两者的互洽,为武当山庙会持续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综上,正是以上诸种因素的交融互摄形成了推动武当山庙会持续兴盛的合力。

参考文献:

- [1]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
 - [2]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3]王远国.中华传统节日诗赏析[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 [4]夏日新.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5]丁世良,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6]贾海燕.战国至西汉楚地北方信仰的产生与发展[J].江汉论坛,2017(11).
 - [7]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J].复旦学报,1956(1).
 - [8]刘玉堂,贾海燕.长沙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涉四方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秋之卷.
 - [9]揭傒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A].陈垣.道家金石略[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0]张廷玉.明史(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2]杨泽善,杨立志.武当山“朝爷”风俗寻踪[J].中国道教,1994(4).
 - [13]姚天国.武当山碑刻鉴赏[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
-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Lasting Prosperity of Wudang Mountain Temple Fair

Liu Yutang¹ Jia Haiyan²

(1. Chu Culture Institut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Province;

2. Chu Culture Institut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Wuhan 430077,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The reasons for the lasting prosperity of Wudang Mountain temple fair are as follows: the integration of Chu belief and religion, folk festivals' coincidence with the birthdate of Xuanwu God, the set-off of magnificent palace buildings and gorgeous natural scenery, as well as the concord of the enlightened religious policy and massive believers.

Key words: Wudang Mountain; temple fair; prosperity; reason